

# 茶马古道上的旅行者和旅游文化

光映炯◎著



Travelers and Tourism Culture  
on the Ancient Tea and Horse Road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10421.4  
12

# 茶马古道上的旅行者 和旅游文化

Travelers and Tourism Culture  
on the Ancient Tea and Horse Road

光映炯◎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马古道上的旅行者和旅游文化 / 光映炯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82-2421-1

I. ①茶… II. ①光… III. ①古道—研究—云南省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2613号

出品人: 周永坤

策划编辑: 张丽华

责任编辑: 张丽华

装帧设计: 刘雨

# 茶马古道上的旅行者 和旅游文化

Travelers and Tourism Culture  
on the Ancient Tea and Horse Road

光映炯◎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60千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82-2421-1

定价: 30.00元

社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电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 序

“山那边是什么?”幼时在心中萦绕过无数次的问题又再次被重复。山的那边,或许有鲜花也有荆棘,有希望也有失望,有惊险也有平淡;或许有蓝天也有阴霾,有热情也有冷漠,有满足也有失落;或许还有……不论如何,自由行者的努力始终是要坚持下去的;不论如何,灰色城堡里的人们总是盼望能找寻到一座彩色的梦幻家园。对远方的向往,对远方的渴求;对梦想的追逐,对理想的憧憬;常常令人不能停下思想行走的脚步。人的命运,就是不停地行走,不断地追问。人生途中,总有不停的过客。来来往往的是旅人,旅人总是来来往往,永不停歇……永不停歇的是人类前行的步伐。

在久远的时空里,云南这块土地上就有了人类生活的痕迹。甚至在云南这个地名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各个族群的人们就在这里开始了旅程。留下,或者离开,过往的人们用脚步一寸寸地走出了关于行走的云南故事。

云南的故事,是一部民族迁徙与交融的史诗。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类往往不会总是待在一个地方,而是要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人类迁徙的旅程,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类自身。常常可以从古老的神话、史诗当中品味古人们艰辛的迁徙生活,以及他们从未停歇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生活在云南的人们,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迁徙与融合后才形成了今天这个多民族的家庭。

云南的故事,也是一部鲜活的旅游史。旅游,是人类的活动之一。从广义的角度而言,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旅游人有很多很多,有氐羌族系,有百濮族系、百越族系,有苗族、有蒙古族、有汉族在云南的来往迁徙旅程;也有大批的军旅、商旅从云南过往;更有无数的旅游者,司马迁、樊绰、郭松年、李京、徐霞客、马可·波罗、洛克、希尔顿、顾彼得、埃德加·斯诺、费孝通、方国瑜、曾昭抡、马子华、艾芜、木霁弘……从古代的到现代的,从国外的到国内的,从探险者到学者、记者,数之不尽。

云南的故事,是一段用兵开发的历史。从庄蹻王滇到诸葛亮南征,从爨氏大姓到南诏大理国,从忽必烈南征、赛典赤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到“羁縻政策”“改土归流”……《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庄蹻留王滇池,分侯支党,

传数百年”，大量的中原人便游徙定居云南。初唐时期，“姚州都督府总管五十七州（县），巨滑游客不可胜数”，以后流落的汉人又大批寄籍云南。于是，无数的军旅屯兵此地，游宦著籍云南。

云南的故事，是一首边地商旅的奔波曲。从历史上对西南夷的最早记载开始，西南地区的氏羌族群就已在马背上过着游牧的生活。“没有旅行就没有贸易，反之亦然。”“马背上的民族”以及众多的族群共同造就了悠久而灿烂的边疆文化。而以马易茶到茶马互市，云南的商贸往来也日益频繁，马背上驮来了众多的集市、古镇，也促进了云南边疆经济的开发、交流与发展，造就了流动的商业文明。

云南的故事，是一出马帮生活的历史剧。云南古代的军途、旅行、商贸都与马帮有关。马背上的人们从遥远的山那边走出来，走向另一处生活。他们的旅游活动大多依赖于马作为旅行的交通工具，也依赖于马帮生活，换句话说他们的旅行活动都必须与马帮生活相联系才能得以实现。甚至，云南古代的旅游活动就是浮沉于云南特有的马帮生活之上。因此，也可以说马帮生活也是流动于茶马古道上的主要旅行活动之一，具有民间旅行活动的特点。马帮生活，是人类在异地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对人类自身生活的一种挑战。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们一步步开拓着脚下的道路，人类的旅程也随着一条条的道路一直在延展着。云南的发展史，是由一条叫茶马古道的链子连接而成的。

茶马古道的命名，源自“茶马古道六君子”。1990年，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一行六人背起背包开始了“滇、藏、川大三角”的探秘征程，常年不停歇。“六君子”的脚印荡漾开来，天下各地的人都知道了在滇、藏、川地区有一条古道叫茶马古道。

但是，最初的茶马古道常常为人所不解，而把它和“蜀身毒道”“唐蕃古道”“南方（西南）陆上丝绸之路”等联系在一起。古道有很多，有古驿道、盐运道、铜道；有丝绸之路、蜀布之路；有陆上的、海上的。很明显，茶马古道是一条体现了以茶文化和马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古道。“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是与“北方（陆上）丝绸之路”相映照而提出的，但只能作为一种文本考证意义上的线路，对于大西南的商旅之道不能做出准确形象的概括。在大西南的茶马古道上，运输交流的商品主要是茶，以及盐、棉布和药材等等，也进行以茶易马，人背马驮是其主要的运输手段。

过去，茶马古道也被认为有三条，第一条是所谓唐蕃古道，即从青海进入西藏；第二条是茶马互市道，从四川进入西藏（这多为政府提倡，设有“茶马司”）；第三条茶马之道就是云南到西藏的通道，这条民间交流的古道可以

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茶马之道。但是，也仍然存有疑问。对古道的探索与追问，是不会停止的。在历史的回顾中，在现实的跋涉中，茶马古道的确切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考证。茶马古道的范围在中国主要包括：滇、藏、川三大区域，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主要线路是：以现今西双版纳、普洱地区、临沧地区的勐腊、勐海、普洱、思茅、澜沧（也就是澜沧江流域）为中心地来扩张，线路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中甸、德钦、左贡、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江、工布江达、拉萨，可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再就是，以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抵达尼泊尔和印度。其中心地域，就在云南的南部、西部和西北部。因此，本书在写作时把重心放在了云南。

茶马古道这条链子上的每一颗珠子都在发出耀眼的光芒。巍峨耸立的高山峡谷，奔腾不息的大江河流；风花雪月的苍洱之情，温婉柔情的绿色之韵，白雪蓝天的圣洁之道，神秘宁静的香格里拉……绮丽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古朴浓郁的民族画卷无不让每一个多情之人驻足留恋；一情一景，又无不令每一位游人发出心醉神怡的感叹。在这条古道上，到处是景，到处是画，到处是歌，到处是诗……到处有旅人的足迹与回声。旅游，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云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在云南这个体验之都，过去与现代同在，古朴与时尚共存。若说古道上的旅游文化古韵是以茶文化和马文化为中心而上演的；那么，古道今天的强大表现力则是其独特魅力的延伸以及城市现代人对大自然的天性向往和对自我反思的寻觅。

若细细考察，关于茶马古道上旅游文化现象的种种描述，无论是茶文化、马帮文化，抑或是历险纪实、田野考察，还是自然景观、民族风情，翻开记忆的碎片或去还原历史的本貌，也都难以言尽。特别是马帮文化，因为潜存于民间而无法通过文字记载去复原其真实面貌。可以做到也只能做到的就是，从有限的文字点滴中找寻那些关于游人以及游人关于古道的记载——《史记》《云南志》《徐霞客游记》《滇西边区考察记》《水摆夷风土记》《缅边日记》《神游玉龙山》《南行记》《滇南散记》《马可·波罗行记》《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消失的地平线》《被遗忘的王国》《马帮旅行》……或许，可以借此以“重构”那段曾经的岁月。一步一个脚印，一个故事一本札记。翻开书本，是笔墨的香气，更是手有余香、回味无穷，而那些沉香的片语便是我们开启一个神秘王国大门的钥匙。

一段段古道，一个个马蹄印，不仅把人们引回到了历史，还唤起了人们内

心深处的探索与追求。循着探寻的脚步，沿着求索的道路，仿佛走进了一条时光的隧道，在感受古代的悠远中反思今天的轻薄，在渺小的自我中发现历史的深厚，在短暂的旅程中体验别样的人生旅途：

从狭长的古道中，我们拥有宽阔的胸襟；  
从艰辛的孤独中，我们领略壮美的风景；  
从简单的生活中，我们体验非凡的富足；  
从漫漫的跋涉中，我们挥洒勇气的无畏；  
从颠簸的漂泊中，我们回归心灵的家园。

过去、现在和将来，云南都是旅行者的天堂，在云南都可以找到梦想中的世界。作为一个旅者，似乎没到过云南就不算是个真正的旅人。然而，又有谁不是旅客呢？对于茶马古道，旅人、商人、探险家、僧人……都是一位路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人人都是擦肩而过；而对于人的生命而言，每个生灵也仅只是匆匆过客。重要的是，茶马古道的生命力就在于：“旅客不得不敲遍每一个陌生的屋门，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不得不在外面的世界到处漂流，最后才能抵达最深处的神殿。”（泰戈尔）这也是“生活在别处”之后对生命本我的回归。

# 目 录

|                          |      |
|--------------------------|------|
| 绪言：人类学视野中的云南旅游史 .....    | (1)  |
| 1. 原始旅游 .....            | (1)  |
| 2. 古代旅游 .....            | (3)  |
| 3. 近现代旅游 .....           | (8)  |
| 4. 当代旅游 .....            | (10) |
| 一、古道古韵 .....             | (14) |
| 1. 司马迁——“蜀身毒道” .....     | (17) |
| 2. 樊绰——“南诏”风情 .....      | (23) |
| 3. 郭松年——彩云之南 .....       | (28) |
| 4. 李京——雪琼水秀 .....        | (30) |
| 5. 余庆远——险路奇俗 .....       | (33) |
| 6. 檀萃——回首是滇 .....        | (36) |
| 7. 杜昌丁——鸟道羊肠 .....       | (41) |
| 8. 李元阳——山水书斋 .....       | (44) |
| 9. 杨慎——边地苦旅 .....        | (47) |
| 10. 徐霞客——奇游奇境 .....      | (50) |
| 二、云南印象 .....             | (55) |
| 1. 马可·波罗——异乡见闻 .....     | (57) |
| 2. 塞缪尔·柏格理——福音之旅 .....   | (61) |
| 3. H. R. 戴维斯——西南之隅 ..... | (65) |
| 4. 亨利·奥尔良——“巴别塔”行 .....  | (69) |
| 5. 弗郎索瓦·方苏雅——他者摄角 .....  | (74) |
| 6. 约瑟夫·洛克——梦中乐园 .....    | (78) |
| 7. 詹姆斯·希尔顿——“香格里拉” ..... | (81) |
| 8. 顾彼得——水城·王国 .....      | (85) |
| 9. 埃德加·斯诺——“马帮旅行” .....  | (89) |

|                          |       |
|--------------------------|-------|
| 三、文人情结 .....             | (94)  |
| 1. 艾芜——漂泊奇遇 .....        | (96)  |
| 2. 闻一多——青云卷舒 .....       | (100) |
| 3. 沈从文——云中漫步 .....       | (103) |
| 4. 冰心——惬意默庐 .....        | (107) |
| 5. 汪曾祺——清茶淡香 .....       | (110) |
| 6. 宗璞——木香燕园 .....        | (115) |
| 7. 马子华——冒险乐园 .....       | (118) |
| 8. 冯牧——滇云览胜 .....        | (122) |
| 9. 丁绍光——调色之弦 .....       | (125) |
| 10. 邓贤——青春之旅 .....       | (128) |
| 四、泊者之旅 .....             | (131) |
| 1. 费孝通——“田野”旅行 .....     | (133) |
| 2. 方国瑜——边走边看 .....       | (137) |
| 3. 李霖灿——雪山卷画 .....       | (141) |
| 4. 游国恩——文献名邦 .....       | (147) |
| 5. 姚荷生——摆夷风情 .....       | (149) |
| 6. 江应樑——行走“边地” .....     | (154) |
| 7. 蔡希陶——绿色旅程 .....       | (158) |
| 8. 曾昭抡——缅边见闻 .....       | (162) |
| 9. 汪宁生——访古探宝 .....       | (166) |
| 五、寻者步履 .....             | (171) |
| 1. 旅行者——《旅行杂志》 .....     | (174) |
| 2. 飞虎队——“驼峰航线” .....     | (176) |
| 3. 木霁弘——“霁虹”飞渡 .....     | (179) |
| 4. 田壮壮——“德拉姆”记 .....     | (183) |
| 5. 旅游者——“茶马古道”文化旅游 ..... | (185) |
| 跋：关于“旅游民族志”的几点思考 .....   | (189) |
| 参考文献 .....               | (202) |
| 后 记 .....                | (207) |

# 绪言：人类学视野中的云南旅游史<sup>①</sup>

旅游<sup>②</sup>是人类的活动之一。对旅游，人们已注重从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与旅游经济学的研究相较，仍表现出话语权的微弱性。对于人类的活动就应该从以“人”为中心的角度进行，人类学大师克鲁伯说过人类学是人的科学，就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科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学就开始参与了旅游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旅游人类学学科。但对于旅游的理解，仅着眼于旅游活动本身，而忽视了旅游作为人类活动的历史积淀和发展过程。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不能抛弃人类学的“整体观”研究方法，而必须从时间纵向、空间横向以及纵横延伸的多纬度进行考察。云南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历史背景造就了云南丰富的民族文化，也常常为旅游者和研究者所关注，所以，要把握云南旅游的发展规律、了解云南旅游发展的未来，就必须对它的发展进行历史的思考。因此，本书将以云南旅游的发展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人类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和梳理。

循着人类历史的足迹，可以发现，云南古代的旅游活动有三条线索，一是团体性的迁徙、移民、充军、流放中的旅行活动；二是个体性的游宦、游士在云南的考察与探险旅行；三就是尤以引起人们注意的大量的群体性马帮生活。需要强调，前两者的旅行活动中也都必须跟从马帮才能得以实现，而马帮生活又潜存于他们的底层，由于其民间性而常被人们所忽略。可以说，马帮生活是流动于茶马古道上的旅行活动，也是对人类自身生活的一种挑战，特别具有云南旅游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 1. 原始旅游

首先，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为研究出发点。历史人类学是以历史时期的族群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关注人类为主体的文化变迁或历史性发展。但是，旅

---

<sup>①</sup> “绪言”已发表在《西南学刊》（第5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sup>②</sup> 这里及本书的旅游，没有旅游学意义上的旅行与旅游之细别，更多的是从广义的角度对旅游进行人类学的分析。

游史的发轫不可能以“人猿相揖别”为起点，因为作为独立人的存在还需具有独立人的意识。旅游史的研究，还需要用考古史来做佐证，但两个历史文化区相似的文物能说明的是文化的传播，或是族群的迁徙，抑或是人类童年时代的异地之行，并不能确切地表明人类早期的旅游活动。再者，又从文学史的角度考察游记和志书并对旅游的发生与变迁进行旁证，游记是中国古代“文以载游”旅游传统的重要表现形式，志书则是中国重史文化传统的结果。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那些游人的亲历游记或部分志书可以被看作是“旅游民族志”的早期雏形。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如果认为人类的旅游史与文明史是同源的也不太符合云南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因此，只能沿着云南多民族的民间口头作品去追溯最早的旅行脚步。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和史诗，最早的口头文学如洪水神话、迁徙史诗、指路经，都反映了古老先民最初的迁徙和旅行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具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探析旅游活动起源的意义。

《山海经》是我国最早的较系统地记载古代神话传说的作品，具有地理学和旅行指南的价值。袁珂先生认为“经”是“经历”的意思，经文中山与山之间的距离、行经方向都是作者所亲历。欧美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山海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理志，是一部令人感到惊奇的包括整个世界旅行的记述。<sup>①</sup>据学者考证，《山海经》中的路线和方向是从南方西南角上的鹊山、招摇山出发（今云南境内），沿着五岭靠南一带，至舟山群岛附近，然后由海道北上至山东境内登陆。<sup>②</sup>《海内经》（第十三卷）中还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黍、育程，百谷自生，冬夏插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宝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是关于先民“西南夷”生活的地方“西南文化区”的最早记录。西南文化区首先是一个地域的概念，同时也反映了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在发展中的关联性。司马迁的《史记》中又说，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过着“迁徙往来无常当初”的游牧生活。而在迁徙过程中，这些游牧族群与云南的土著逐渐接触形成了早期的氐羌部落，并与百越部落和百濮部落先民发展为今天居住在云南的众多民族。如哈尼族的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反映的哈尼族迁徙路线，据考证它与考古学所证实的氐羌族群的迁徙路线基本相同，也充分说明了云南历史时期的最早族群的迁徙征途。<sup>③</sup>

① 箫兵. 楚辞文化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434

② 沈祖祥. 旅游与中国文化 [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8: 132

③ 史军超. 滨海文化与高原文化的嫡裔——哈尼族迁徙史诗研究. 边疆文化论丛 [C].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8: 124

先秦时期，尽管元谋人在这里开始了人类的最早足迹，但云南更多的只是从属于“西南地区”的一个地理概念，而且还是一个蛮荒之地。早期的族群在历史迁徙中才逐渐形成对“自我”族群的意识，仍处于人类的童年时期。与中原地区的相对集权相比，云南地区的文化形态还处于一个相对松散的时期。但是，异地空间的迁徙已蕴涵了旅行活动发生的内在动力，属于云南旅游的孕育阶段。虽然，这些旅行活动都附着在原始族群的迁徙中，没有从人类的最早生活中脱离出来，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孕育着旅游活动产生的内在动力，即在人类生存空间中的异地趋向力。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是，先秦时期的云南没有像孔子和老子那样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因此旅游观也没有受汉文化思想的影响，无所谓“有方之游”。因此，先秦时期的云南旅游，表现为一种西南文化区的族群游踪，或者说云南旅游史的最初旅游文化形态表现为以族群流动为载体的迁徙旅行。这个时期的旅行受生计方式制约，体现为沿着山脉、江河走向，寻找乐土的自然迁徙的特点。

## 2. 古代旅游

秦汉至元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特别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和元明清时期的政治、行政变革造成了大规模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迁徙、流变，使云南境内的民族发生了复杂化和混合的共融生存状态。云南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特色的形成，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如果说，先秦以前云南地区的族群是旅游文化的主体，那么，先秦以后云南的民族文化则是处于中央权力“大一统”的“下层文化”。行政和儒学的力量在偏远的地理位置上和具有地方特色的“羁縻政策”中得到了一定的稀释；“改土归流”的影响并没有从深层上改变云南民族文化的特质。云南民族文化因此所呈现出多元而多彩的独特性，也是主流社会群体的旅游吸引对象——“他者”的异文化的最大特色。（这种旅游现象，到现当代依然如此。）

古代旅游的特点还在于，云南在受到中央的集权统治后，政府官员、商人和文人的旅游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哲学思想和旅游审美观念。比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司马迁的壮游的影响；李元阳、杨慎追求“心游”的自然审美态度等；中国文化中重史、重真实的传统使徐霞客具体表现为一种求新知、探奇异的旅游精神。虽然，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念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与云南的边疆开发史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是军旅、官旅、商旅和学旅等主要旅游形式的存在，特别是商旅活动的繁荣。同时，官旅、商旅等旅游活动又促进了交通道路的发展，茶马古道的上演便是很好的说明。

另一方面,也由于云南的地理位置,高山峡谷、崇山峻岭造成了人类前行的困难。从秦朝“置吏通道”以至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变革,交通对社会和旅游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公路修通以前,云南省内和通往省外的交通主要依仗驿道,因此,“马拉人驮”是主要的旅行交通工具。“鸟道羊肠”“蛮烟瘴毒”是外来旅行者对云南的“第一印象”。自元以降,明、清以至民国,驿道主要路线一脉相承,“古道”和“旅游”相辅相成,在古道中旅游,在旅游中游览古道上的风景,是古代旅游与交通快速便捷的现代旅游的一大区别。

古代的旅游,主要是少数人的旅游。对于大众旅游而言,是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或民俗等其他原因才形成了一定的大迁徙或旅行征程。这些旅游活动虽然附着在其他一些社会活动的背后,但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旅游文化。

#### (1) 秦汉至元以前——中原文化与边缘文化在族际交流中的军旅、商旅

秦汉时期,中央统治者在边疆置吏通道,把郡县制度推广到边疆,标志着云南正式成为封建中央王朝版图的一部分,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也从此拉开了序幕。而这种关系开始表现为:中央对西南夷的军事统治和经济开发为主要形式的族际交流和接触。同时,郡县制的实施也使云南开始从“西南”地区渐渐独立出来。“南征北战”式的军旅、商旅活动,是这个时期的主要旅游形式。

司马迁,历史民族学之父,其著作《史记》在中国西南民族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南夷列传》被认为是一卷研究西南民族文化区的历史民族志著作。<sup>①</sup>云南历史有纪年可考的开端,也正是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开始的。司马迁一生中最重要的有三次旅行,其中一次就是24岁那年的“奉使蜀滇”。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地区最早生活着三类部族,其中在今澜沧江以西和滇西地区的一类部族,编发、牧畜、逐水草迁徙,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不难发现,早期的旅行活动是以“马匹”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庄蹻入滇”,是早期中原地区移民到西南数量较多的一次,“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也可看作云南旅游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批军旅者。当时的商务旅行也十分频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当时的旅馆“客舍”已成为一种带有服务性质的行业,是云南旅游业发展的开端。

以后,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的扩张、征讨和开发成了云南发展史的主要内容。诸葛亮于公元225年南下“平定”了南中以后,只剩下了霍、爨、孟

<sup>①</sup> 宋蜀华.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索.王筑生.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91

三氏。公元339年，爨氏成为最强大的势力，在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年时间里，爨氏的统治在乌蒙滇洱地区，包括整个云南、贵州西部和四川南部，即“南中”地区。以大、小爨碑为主反映的爨文化，就是一种中原汉文化与边地夷文化接触和交流的体现。

初唐时期，“姚州都督府总管五十七州（县），巨滑游客不可胜数”，于是，流落的汉人大批寄籍云南。到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王”和中原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唐天宝年以后，南诏的疆界已经很广。南诏的疆界大致已包括了今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缅甸北部、老挝及越南北部。<sup>①</sup>多元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一时形成了该地区多元性的“南诏大理国”文化。大理地区特有的本主崇拜信仰，即融会了土、巫、儒、佛、道各家因素。这个时期，云南边疆与中原地区、现今东南亚接壤地带的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樊绰在《云南志》一书中较系统详细地记载了南诏地区的交通、名山大川、主要城镇、南诏政治制度、各民族风俗习惯等，并最早使用“乌蛮”“白蛮”来称谓云南的原住民。他还重点描述了大理的民风民俗和商贸往来。当时的经济贸易尤以河賧地区（洱海区域）商人最为突出。商务活动和商务旅行，繁荣了云南的商贸古道和旅行交通，也促进了马店业、旅游接待行业的发展。

## （2）元明清时期——云南多元民族文化融合下的官旅、学旅、商旅

公元1274年，中央统治者在云南建立行省，标志着郡县制度在云南的巩固，并改定路、府、州名号。大批的蒙古族和回族迁入云南，融入到云南边地的生产与生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大力倡导儒学，至元十九年（1282年）“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这个时期，云南的地方文化受到了儒学“大一统”思想的影响。

到大理任官的郭松年巡行于云南大理，在其历史题材的游记文《大理行记》中已反映出大理地区的风俗“俗本于汉”。李京，以吏部侍郎奉使安南（今越南），“周屡云南”，将边地的风景与中原地区相对照，写下了著名的旅游文学诗作《雪山歌》。中世纪意大利的杰出旅行家马可·波罗，1275年到达元朝的上都并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并被派往“名叫哈刺章的城市，处理一件重要的国务”。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基本上是依靠“站赤”。而站赤是元代在行政设置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当时游客歇脚的重要地方。

自元代起，特别是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统治采用了特殊的“羁縻政策”，即任命可世袭的“土人”（非流官）以“司”该地之

① 方国瑜主编. 云南郡县两千年.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 1980: 96

事务,又叫“土司制度”。这种统治制度,带来了一股土司或代办的旅行时髦风。<sup>①</sup>明代的旅游,不仅中原地区包括云南边疆也达到了鼎盛时期。明万历年,久任云南布政参议谢肇淛撰《滇略》云:云南“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云南与中原文化的接近由此可见。这个时期,“近游”也已变为“远游”,徐霞客的母亲亲自为其缝制了“远游冠”,勉励其远游。后来,徐霞客成为了中国古代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并写出“自古至今未有之奇书”“古今游记之最”的《徐霞客游记》,在中国探险考察旅游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滇游日记》部分记载了云南大量的旅游发展情况,如在洱源县清源洞,“人竞游之,光景甚异。从此至二月,游者已多”,云南的旅游由少数人的旅游发展到了大众化的旅游。

到清朝,“改土归流”的施行再度使大批汉人涌入云南。曾任禄劝县知县和代理元谋县知县的檀萃,在滇二十年间,“旅食四方”,著名的《滇海虞衡志》中特别写到了昆明的旅游,如“龙泉院(今黑龙潭)之唐梅以腊月,太和山之铜瓦寺(今金殿)以正月,官民士女,輿骑填委,迄于归华寺(今金马山腹),为祖钱通衢……”到近郊观光的城市旅游,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书中还记载了当时的许多民俗风情和商贸往来的旅游文化现象。

此外,明代学者杨慎于1524年因上书“大礼仪疏”顶撞了嘉靖皇帝被流放到今保山地区。在滇三十多年,“志山川,表里俗,采风谣”,《滇程记》成为研究云南的重要民族学资料。李元阳则以大自然为家,居于大理点苍山十八溪,悠游林下,与名人杨慎等畅游于苍洱之间,在许多寺观名胜留下了他的足迹和字迹。清康熙年间,杜昌丁随云贵总督蒋陈锡进藏,记下了《藏行纪程》。余庆远在《维西见闻录》中则记录了维西六种“夷人”的民风民俗。

这个时期,云南的地方文化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多方面的中央统治下形成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状态,并对云南的旅行活动产生了复杂、多元而深刻的影响。旅游形式表现为“颠沛流离”的以官旅、学旅、商旅为主的旅游活动。

### (3) 清末——西方人的宗教旅行和异国之旅

由于云南与中原、东南亚地区在地缘上的亲缘关系,宗教在云南的传播一直未曾中断,并形成了南传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共融并存的现象。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等西方宗教在云南的传播,不仅吸引了西方世界对云南这片土地的关注,对云南在世界上的广泛影响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自明代大约16世纪以后,西方宗教开始了向中

<sup>①</sup> 江应樑著,江晓林笺注. 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M]. 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 2003: 150

国传播的历史。对清朝政府的反抗斗争和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入侵，加快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到清朝末年，又有大批西方传教士、探险家、科学家或商人来到中国的西南隅进行传教等活动。

19 世纪中期，法国外方传教会率先从中国内地进入藏区传教，开始了宗教之旅。1850 年前后，法国传教士勒努（化名罗勒拿）沿着自西藏流经云南的一条大江的水流逆流而上，于 1851 年 2 月进入云南。后来，又沿着金沙江到了丽江和中甸，开始了在云南地区的传教活动。从 1885 年至 1949 年，基督教新教的英国卫理公会（即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的滇、黔、川一带进行了长期的活动。1887 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昭通传教，并建立了循道公会西南教区。以至于当时的国内教会界称该区域的宗教、教育中心石门坎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而这些宗教的存活和布道地区都是在云南的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生活区，形成了云南独特的地方宗教文化。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在分割完海外殖民地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考古探险热潮。1886 年，法国方苏雅被法国外交部派往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安南（越南）。1896~1904 年，被派往中国先后担任了法国驻中国广西省龙州领事和云南省总领事，主要到过滇、黔、桂和越南几个地方。关于云南《老照片》在现代化的土地上的游历和展示，是现代人对古老文化的返璞，也是对云南文化变迁的真实影像。英国学者 H. R. 戴维斯，参加了英国拟在云南修筑铁路以联结其印度和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可行性研究项目，于 1894~1900 年先后四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调查，行程几千千米，考察了云南几乎所有的地方；并向西方提供了云南原住民的四大系分类（孟高棉人、掸或泰人、汉人和藏缅人）。约瑟夫·洛克，1922 年 2 月受美国农业部派遣，来中国云南寻找抗病毒的栗子树种，开始了他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探险旅游。他对滇西北有过详细的考察，写了著名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书中的一句话“我宁愿死在风景优美的山上，也不愿意孤独地待在四面白壁的病房里等待上帝的召唤”，常常吸引着无数的游人加入到前往云南的行列之中。1933 年，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受洛克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影响出版了作品《消失的地平线》，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寻找理想国“香格里拉”的热潮。人类学研究的兴起，就与西方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扩展和探险历程有着重要的关系，外国人对“他者”的关注和记录就是西方学者重要的民族志资料。20 世纪 40 年代，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丽江之地，“凭着设想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圣山”。

清末，是西方宗教向东方进行广泛传播的时期。对于希尔顿和顾彼得这两个本应属于近现代的人物，作者将其划分到清末，不是按其生活年代来进行划

分，而是从他们的旅游活动和民族志研究资料所起的作用进行归纳。可以说，云南作为旅游目的地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与西方传教士和探险考察者对云南的宣传是分不开的。

### 3. 近现代旅游

抗战时期，带给了人类太多的痛苦与奔波，也是人类学在中国筚路蓝缕的发展阶段。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南迁，西南联大在云南的成立，不仅给云南带来了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西南联大所培养造就的人才以及所形成的学术力量在中国的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对于流亡的学者和文人，云南也是一个风情万种和令人思绪飞扬的地方。对于人类学者来说，云南是“一个号称人种博物馆的省份”，并形成了学术界的“魁阁”研究群，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人类学的研究群体中，当首推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所产生的影响为大。他于1938年从西贡登陆进入云南，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主持成立了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战乱时的研究室就在今天呈贡大古城魁阁，费孝通与陶云逵、张之毅等一批学者都曾深入呈贡、禄丰、大理等社区进行了调查，并著有《云南三村》和《乡土中国》等重要的人类学作品。孔子的“近游观”是其思想“仁”的结果，而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人“乡土性”特点的概括则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出了“近游”传统的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关于中国“民族志旅游”的兴起，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在云南“游山玩水”或“旅游”的以费孝通为主的一大批人类学者。潘光旦先生在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中对游山玩水之人的兴趣分为三类。<sup>①</sup>无论如何，学者们都喜欢游览，不是单纯的旅游而是带着对某一领域的热情与关注。若用旅游人类学领域的“民族志旅游”一词，则更好地体现了他们的旅游观念，这群人类学者应该算是真正的“民族志旅游者”，他们亲自通过“田野调查”并对“异”文化进行观察、记录和描述。所以，民族志旅游的旅游者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我群”对“他者”的观察者，也是以他者身份参与“他者”生活的参与者。于前者，他/她是一位“特殊”的旅游者；于后者，他/她是一位“特殊”的研究者，这种“特殊”性也就是对异文化的深层关注。

云南“本土”的民族志旅游者也很多，1937年，方国瑜先生到滇西边地考察，著作《滇西边区考察记》等已成为民族学和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参考

<sup>①</sup> 费孝通. 山水、人物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7